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ali Based on Epigraphy: Reviews on Zhu An'nu'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i Nationality's Ancient Documents over Epigraphy*

YANG Qi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26, 2022

Accepted: May 10, 2022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YANG Qing. (2022).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ali Based on Epigraphy: Reviews on Zhu An'nu'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i Nationality's Ancient Documents over Epigraph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 101–10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12](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1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12>

Abstract: The ancient epigraphy literature of the Bai nationality had been often sorted out, but it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s relatively rare. Zhu An'nu's academic work, which name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i nationality's ancient epigraphy literature*, had regarded epigraphy literature as a unique carrier of Bai nationality's culture and carried ou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Bai nationality's ancient epigraphy literature, it was uniqu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This book seemed simple and unadorned, but in fact, it was carefully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internal academic and objective reality. It not only enabled the Bai nationality's epigraphy literature and common ancient literature complementary, but also integrated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o find cultural concealment, the relevant argumentation was close to the academic frontier, and fully demonstrated the research personality in following the trend. The author had long-term continuous attention to the Bai nationality's epigraphy literature and was superior to an ordinary scholar in academic feelings and humanistic realm, and on the whole, she had shown a relatively rare academic concentration and research level.

Keywords: epigraphy literature; Bai nationality of Dali;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YANG Qing is a Literature Doctor of Sichuan University and also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基於金石學的大理歷史文化尋隱

——朱安女《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讀評

陽 清

雲南師範大學

摘 要：白族古代金石文獻存量可觀，對其進行整理之作較為常見，相關全面研究則相對稀少。朱安女《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一書，將金石文獻視為白族文化的獨特載體，基於白族古代金石來進行文化闡釋和綜合解讀，在雲南少數民族歷史傳統研究中獨樹一幟。該書看似樸實無華，實則基於內在學理和客觀實際來用心建構，不僅讓白族金石與傳世文獻達成互證互補之用，而且融匯文史哲等多種學科視閩來進行文化尋隱，相關論證緊貼學術前沿，在順勢而行中充分展示了研究個性。撰者對白族金石文獻進行長期持續關注，在學術情懷和人文境界方面優於常人，整體上展示出了比較難得的學術定力和研究水準。

關鍵詞：金石文獻；大理白族；文化闡釋

一、引言與前人研究情況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多元融合且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古老民族，白族主要分佈于雲南、貴州、湖南等省，其中以雲南大理州人口最多，比重約占百分之八十。今天的大理，是白族的族源地、祖居地和主要聚居地，故其在歷史傳統層面印證了白族的輝煌往昔。從春秋戰國時期的昆明夷，到漢魏六朝的郡縣置吏，從唐朝的南詔政權，到宋代的大理國，乃至元明清之際大理路、大理府、滇西道等，大理白族燦爛的古代文化，已在紙質文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彰顯。與紙質文獻相互發明的，則是堅固耐久的金石文獻。早在宋代，趙明誠就指出：「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①歐陽修亦認為，金石「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于多聞」^②。大理偏居中國西南一隅，白族在金石文獻中尋找到了記錄歷史的最佳方式。由朱安女撰寫的《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一書充分吸收前賢治學經驗，是基於金石之學對白族古代文化進行尋隱的匠心之作。

與雲南其他少數民族相比，大理白族的金石文獻不僅存量豐富、種類多樣，而且歷時久遠、內涵深刻。自近古至今，針對白族金石進行文獻梳理或整理者不乏其人。明清以來，雲南不少方志已收錄大理重要碑刻。從李元陽纂《萬歷雲南通志》、劉文徵撰《天啟滇志》，到范承勳修《康熙雲南府志》、周鍾嶽纂《新纂雲南通志》，這種做法已漸成傳統。與此相關，李根源輯《雲南金石目略初稿》、趙成傑編著《雲南石刻文獻目錄集存》、方樹梅輯《滇南碑傳集》、孫太初著《雲南古代石刻叢考》、重慶市博物館編《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彙編》、羅二虎主編《西南考古文獻》等書，往往通過著錄、輯錄、叢書等方式，積極關注白族金石文獻。以大理金石為專門對象，則有楊世鈺、張樹芳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編》，以及段金錄主編《大理歷代名碑》等整理成果。以大理所轄某市、縣、鎮或者某處的金石為考察對象，還有大理市文化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大理市古碑存文錄》、趙敏主編《大理洱源縣碑刻輯錄》、馬存兆編《大理鳳儀古碑文集》、李毓東主編《祥雲金石》、黃正

發編著《彌渡古代碑刻輯釋》，以及石鍾健撰《大理喜洲訪碑記》、方齡貴撰《大理五華樓新出元碑選錄並考釋》等著作見於當代。要之，大理金石文獻相關整理之作已較為豐贍，藉此證實白族古代文化底蘊深厚，非同尋常，值得後人考察和進一步探尋。

與整理成果相比，當今對白族金石文獻進行系統研究之作畢竟較少。據考察，除了關涉上述部分著作，現有陳子丹《雲南少數民族金石檔案研究》、周祐《大理古碑研究》等著作，直接以雲南金石或大理古碑為研究對象者。也有以白族金石文獻為佐證，從歷史、考古、宗教、文學、人類學等層面具體研究大理文化者，張旭《大理白族史新探》、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劉光曙《大理文物考古》、田懷清《大理考古與白族研究》、李東紅《白族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研究》、張文勳《白族文學史》、侯沖《白族心史——〈白古通記〉研究》等著作，即可作為代表。與此相關，一些反映大理白族文化的叢書、專著、論文集、學位論文以及單篇文章，亦程度不等地運用金石文獻來進行學術論證。儘管如此，全面關注白族古代金石文獻，藉此從多種視角進行文化闡釋、綜合解讀並且彰顯創新、勒成一部者，朱安女此書尚屬首次。本書將金石文獻視為大理白族文化的獨特載體來進行系統研究，在雲南少數民族歷史傳統研究中獨樹一幟，呈現出了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價值。

二、全面系統解讀白族金石文獻

迄今為止，全面系統解讀白族金石文獻之作較為罕見，一是因為不少青年學者在學術視野和研究手段上，往往容易忽視「二重證據」的綜合運用。早在晚清時代，王國維提倡「二重證據法」，認為：「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③陳寅恪亦概括王氏「二重證據法」在二十世紀初的發展，所謂：「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④。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文獻資料較易獲得的當代社會，部分從事傳統學術研究的青年學者，依然在學術意識方面淡化金石學證據。本書則以金石文獻為主要載體，同時參照其它證據，在諸多闡述中與前賢大家不謀而合。二是緣於這種學術研究難度較大，非勤於此道、樂於此事者難以畢其功。換句話說，試圖以金石學為基礎，對白族古代文化進行整體研究，尚需做出如下種種努力：其一，對大理白族金石文獻進行鳥瞰和全景式把握。這要求撰者借助相關地方誌、目錄、總集、叢書甚至是通過田野調查，全面吸收前賢梳理或整理成果，扎實做好前期基礎工作。其二，對這批金石文獻進行文本精讀，認識並掌握其文化內蘊。這不僅要求撰者視闊開闊，思路清晰，而且必須理解透徹，判斷準確，方能得出確切的學術主題以及主次輕重。其三，對這批文獻的文化內涵進行總結和歸類，藉此建構某種闡釋框架。這要求撰者以文化為關鍵和核心，根據內在學理和客觀實際，對不同學術主題進行匯總，對結構體系進行設計，藉此確定章節安排。其四，以章節為單位，以文化闡釋和綜合解讀為方式，在學術實踐中進一步體悟該研究話題，優化其內容和論點，調整其證據和案例，提升其內涵和特色。這要求撰者具有統籌兼顧、整合融匯文本的能力。檢讀朱安女《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該書之所以能夠做到高屋建瓴，有條不紊，抑又擘肌分理，勝義紛陳，實際上源於撰者較為嫺熟的研究經驗、優秀的學術素養以及較為難得的綜合分析能力。

從該書《導論》看，撰者對白族金石文獻了然於心，其學術綜述雖然簡略卻契合前人研究現狀。以此為基礎，全書分為六章，亦即從文化制度、帝王治世思想、族群意識、儒釋道受容、生命觀、文學價值等六個層面，來具體闡釋白族古代金石文獻，其主題分類科學合理，結構上呈現出學術性和邏輯性。誠如撰者所言，本書的研究目的具有雙重性：「首先，考察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起源、興盛、發展與文化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其次，在歷史、政治、文化、宗教和藝術的背景中來理解這些金石文獻，形成對這些金石文獻多維的文化



闡釋。」^⑥從章節篇幅看，撰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制度和帝王治世思想方面，客觀彰顯出了白族金石文獻的歷史特殊性和功能指向。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制度建設、國家治理、政權關係及其前因後果，既為探尋白族古代文化提供了宏觀背景，又為具體考證和後續可能提供了某種依據。梁啟超指出：「夫成績者，今所現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績以為之因；而今之成績又自為因，以孕產將來之果；因果相續，如環無端必尋出其因果關係，然後活動之繼續性，可得而懸解也。」^⑦檢讀具體章節，該書在闡釋文化制度時，從漢地以前說起，一直談到明清之際，宏觀上涵括多種學術內涵，實為簡約型的大理白族文化史。在闡述帝王治世思想方面，則從有唐一代開始，不僅更為具體可感，而且重點相對突出。在闡述族群意識、儒釋道文化受容以及生命觀等方面，則打破前述兩章的撰文體式，不強求用力均勻、整齊劃一，而是依據白族金石文獻本身來進行內容調整和自由發揮，尤其體現出撰者的能動性。在闡述文學價值方面，撰者從文獻體式、文學經典、文本語言、文章審美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同樣令人信服。一言以蔽之，《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一書看似樸實無華，實則由朱安女匠心獨運而成。撰者基於白族金石文獻，主要關注大理古代文化，從內在學理和客觀實際來用心構設，而不是空談闊論乃至無的放矢，其例證使用往往呈現出時間邏輯，其具體論證基本上做到收放自如，從容駕馭，其學術風格可謂自然坦誠，總體水準較高。

三、兩類文獻的互證與視閥融匯

大量使用金石文獻的意義，除了其本身昭示豐富的文本內涵，正是在於與紙質文獻和傳統研究達成互證甚至互補之用。一般來說，金石學價值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曰考訂，統經史小學而言；一曰文章，重其原始體制；一曰藝術，兼賅書畫雕刻」，其考訂之用，「可以證經史之同異，正諸史之謬誤，補載籍之缺佚，考文字之變遷」^⑧。從具體章節看，《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一書不僅以金石證據為主體，藉此昭示大理古代文明，而且試圖參考傳世文獻，努力實現補證意義，通過把大理文化與漢文化進行有意關聯和緊密銜接，最終很好地實現了研究宗旨。譬如從帝王治世思想看，該章從南詔閣羅鳳「德化」立國談起，繼而論及異牟尋對「德化」治世的深化，後又闡述大理段世治國思想、元代治世思想等，主要基於白族古代金石文獻，同時參考引證《新唐書》《舊唐書》《宋史》《元史》《資治通鑒》《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滇史》《滇略》《滇雲歷年傳》《雲南志》《楚古通紀》《南詔野史》《大理行記》等不同時期的史學著作，讓兩種文獻證據在具體研究中相輔相成。又如從儒釋道文化受容看，該章分析白族金石文獻「蒼洱境」家園的文化生態書寫，主要使用《南詔德化碑》《詞記山花詠蒼洱境》《遊天臺觀詩碑》《遊洱海浩然閣燕集臨水亭記》等石刻文獻，抑又引證《論語》《禮記》《老子》《莊子》等早期儒家、道家文獻，從傳統文化層面來提煉學術主題，試圖凸顯學術創新。又如從文學價值看，該章以《南詔德化碑》為學術個案，將該碑內容與《左傳》《文心雕龍》等進行比較分析，藉此論證白族古代金石文獻與漢文學經典之共鳴，無疑充分展示了前者的文學內涵。該章在進行語言研究和審美研究之際，引證大量常見的傳世文獻，以漢語典故使用為例，詳細論證白族古代金石文獻對漢語的精熟使用，又以唐代《大周故河東州刺史之碑》為例，通過論證傳統中國碑造型與佛教文化的融合，闡述白族古代金石文獻審美中的文化交融之象，同樣可謂細緻入微，在同時代著作中較為難得。

本書的特色和優勢，還在於融匯文史哲視閥來集中探尋大理古代文化。作為近年來流行的科學方法，跨學科交叉研究旨在超越以往分門別類的研究方式，以實現對某個學術問題的整合性探討。基於白族金石文獻，試圖對大理古代文化進行尋隱，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具備宏觀的學科視野，另一方面必須注重銜接人文社會科學內部的學理關聯。文史哲的會通，「就要使文學對人情世事體驗的情感表達與心靈意會、史學對生活變遷洞察的實踐理性與歷史智慧、哲學對宇宙人生感悟的本體追問與終極關懷等獨特生命領會得以溝通和共享」^⑨。本書不惟以史學為主要視角，從中央政權的體制、制度、政治、外交等層面來聯結和闡釋白族古

代金石文獻，而且專章論及這批文獻與傳統哲學、宗教之時代淵源，同時又揭示其文學本質與藝術內涵，足見撰者通過統攝「四部」和文史哲領域，力求實現某種學術整合。非但如此，本書還以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為參照，結合宗教學、社會學以及生態學，考察白族的族群意識、理想家園、生命觀等，又在每個專題論述中糅合各部文獻，吸收不同學科意識。正因為如此，本書各章不是畫地為牢，而是隨意之所至，順勢而為，關注並緊跟學術前沿，充分體現出了撰者的學術個性。譬如，書中指出白族金石文獻對族源的記憶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明代以前，「阿媿白」崇拜體現了白族對民族起源的自我意識。明代以來，「觀音的子民」、「九隆（龍）裔」成為人們較為普遍的看法。清代族譜的書寫成為白族對族源追述的重要形式。而在現實的生活中，白族和其他民族通婚的歷史一直伴隨着白族的發展，白族與其他民族血緣、文化的融合不斷強加，形成了民族的真正交融。」^⑨又如，書中認為白族人對「蒼洱境」的書寫：「無論是寫實的描述還是浪漫唯美的表達，都傳達出白族棲居的大理壩子是一個被蒼山洱海環抱、自然和諧的空間，它是遠離塵世喧囂、人生煩惱的山水田園。在這裡，人們不約而同感受到的是田園生活的和諧與寧靜，而這種和諧、寧靜也是蒼洱境不因時代、歷史變遷的生機與吸引力。」^⑩這些結論，一是基於兩類文獻互證自然得出，二是融匯多種學科視閥以求創新，在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當代背景下，客觀上呈現出了學科、學術以及話語價值。撰者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引，書中不少闡釋論證與主流意識形態不謀而合，具有比較重要的現實意義，必然為後續研究提供某種學術範式。

四、长期的研究實踐與學術情懷

這種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長期學術實踐的必然結果。顯而易見，撰者有意對白族金石文獻進行持續地關注，並在循序漸進中推進和深化文本闡釋。從學術經歷看，撰者致力於整理和研究大理金石幾近二十年，故能達到某種從容之境。茲據調研，試詳言之。2002年至2005年，朱安女求學於西南師範大學，師從劉明華教授，獲得文學碩士，其學位論文題曰《〈南詔德化碑〉和唐代天寶戰爭詩研究》，已用金石文獻與傳世文獻進行互證。2008年至2011年，她求學於四川大學，師從劉文剛教授，獲得文學博士，其學位論文題曰《白族古代碑刻研究》，顯然是在前續研究基礎上，進行了內容豐富和話題拓展。2004年至2011年，朱安女撰寫兩級學位論文之際，在《民族文學研究》《雲南民族大學學報》等重要期刊，先後發表《〈南詔德化碑〉與先秦經典文學》（2004）、《「宋揮玉斧」之下的一個慘痛案例——大理國白氏碑與蘇洵散文〈張益州畫像記〉考釋》（2006）、《白族二爨碑文體與〈文心雕龍〉詠碑理論範式》（2010）、《明清時期白族隱逸文學的文化闡釋》（2010）、《楊慎復興華夏文學思想的文化解讀——以〈禹王碑〉〈禹碑歌〉為例》（2011）等系列論文，從歷史、文學、文化等層面，積極思考和挖掘白族金石文獻的學術史意義，充分運用學術互證來進行探幽索曠，使之提升到一個新的學術高度，產生了較大影響力。基於博士學位論文，她在2012年出版首部著作《文化視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後來獲得重要學術獎勵。2012年迄今，朱安女繼續關注和研究白族金石文獻，又在《民族文學研究》、《杜甫研究學刊》等重要期刊，先後發表《白族「蒼洱境」理想家園的文化生態書寫》（2012）、《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地域文化特點》（2013）、《南詔「德化」治世與儒學在雲南的傳播》（2013）、《明清時期白族文人「學杜」風尚的文化探析》（2013）、《劍川石窟文獻與南詔大理國時期的佛教信仰》（2014）、《論南詔大理國時期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特點》（2015）、《從石刻文獻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白族文化》（2016）、《南詔大理國白族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教育理念及模式初探》（2017）等多篇學術論文。這些文章的思路更加開闊，內涵更為深廣，橫跨多個學科領域，提出多種新穎的論點，在學術界激起了更大反響。本書題為《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2019），正是在她首部著作《文化視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付梓以後，經過多年的沉潛與積累，基於白族金石對大理古代文化進行深度尋隱之作，同時也是研究這一話



題的集大成之作。

這種學術研究還需要情懷和境界。唯有對大理白族滿懷溫情,對中華民族心生敬意,才能綿綿用力,久久為功,通過銜接地方文明與中央主體,把涓涓細流匯成汪洋大海。大理為風景名勝之地,文獻薈萃之邦。朱安女正是大理白族人,現就職于大理學院文學院,故其不忘初心,話題如一,長期致力於溯源和發揚大理文明。從主持承擔的各類項目和出版發表的學術論著看,她一直從事于白族古代金石文獻與文化研究,幾乎把全部精力和心血奉獻給了大理這片熱土。據悉,就在本書付梓之後,朱安女又出版了學術著作《劍川石窟文獻研究》(2020)。通過長期的學術實踐,她已經成為研究大理歷史文化不可多得青年學者。

五、結論

綜上,白族屬於華夏民族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自身發展的曲折歷程、文明基因以及文化內涵,在增強中華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試圖對大理古代文化進行尋隱,的確需要廣泛使用白族金石文獻,藉此進行充分闡釋和全面解讀。畢竟,「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裡」,「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抄板刻,輾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⑩。從很大程度上講,朱安女此書全方位、多視角地闡讀白族古代金石文獻,不失為成功的學術案例。通過文本細讀、用心感悟以及坦誠為文,該書為弘揚雲南優秀傳統文化、加快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出了一己之力。誠然,白族金石文獻研究尚有一定學術空間,將來更為周詳之作應該可以預期,但不可否認此書在當代學壇的重要意義。

注釋

①(宋)趙明誠:《金石錄》(敘),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四部叢刊》續編本。

②(宋)歐陽修:《集古錄序》,《歐陽修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頁1087。

③(清)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頁2。

④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陳寅恪著《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頁247。

⑤朱安女:《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導論),巴蜀書社2019年版,頁6。

⑥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頁3。

⑦朱劍心:《金石學》,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頁4。

⑧漆思:《文史哲會通的人性自覺與中國哲學史的重寫》,《江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頁18。

⑨朱安女:《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巴蜀書社2019年版,頁206。

⑩朱安女:《白族古代金石文獻的文化闡釋》,巴蜀書社2019年版,頁229。

⑪(清)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潛研堂文集》卷二五,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頁396。

⑫ LIU Yong & WANG Ke. (2022). A dynamic study on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1), 034-043.

⑬ DU Haitao. (2022). The embodied meaning of "disease"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interpretation of body-life managem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043-051.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